

抗日战争前期

1937年7月—1938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奋起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了一起事端，由此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全国的抗战由此开始。

（一）“七七”卢沟桥事变，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卢沟桥事变前，北平已处于日本政治军事侵略进逼的紧张形势之中。

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后，便开始向华北扩展，河北、察哈尔两省首当其冲，北平、天津两市不断受到骚扰、威胁。1935年日本加紧策划分离华北，“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中国国民党组织及国民政府中央军政势力从冀察撤出。在日本压力下，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冀、察、平、津，使这两省两市成为特殊地区。汉奸殷汝耕在日本卵翼下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长城以内20余县，等于把这大片领土归入了日本势力圈内，使平津处于它的紧逼之下；而这个“政府”就设在北平城东仅20公里的通州，显示出日本侵略势力对北平虎视眈眈。1936年，以天津为大本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实行新编制并空前大扩军，兵员

总额由 1771 名激增至 5774 名；加强军事部署，天津的军司令部之外，又在北平设立步兵旅团司令部，驻屯军步兵第二团及军直属各部队驻天津，第一团主力驻北平、丰台，其他步兵部队分驻于塘沽、滦州、秦皇岛、山海关诸地。^①这时驻守冀、察、平、津的中国军队是宋哲元的第 29 军，总兵力 10 万人左右；第 37 师、骑兵第 9 师等分扎于北平西苑及南苑、北苑、黄寺等地，第 38 师等驻于天津及平津间的铁路沿线。“中国驻屯军”的新部署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与之对峙的局面。从政治军事形势上看，日本新的侵略已不可避免。

对峙最直接而严峻的是丰台一带。“中国驻屯军”自 1935 年底非法进驻这里后，不断欺压当地中国驻军。1936 年 6 月及 9 月两次挑起丰台事件，把中国驻军挤了出去，日军侵占了丰台镇。7 月，日军在丰台设立军事指挥部，此后丰台驻军陆续增至 2000 人。^②1937 年 4 月，日军开始在平津近郊举行演习。从 6 月起，丰台驻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益加频繁。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驻屯军”在酝酿着什么行动。这时，在日本首都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中已传出：“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这一夜，“中国驻屯军”果然挑起了事端。

1937 年 7 月 7 日下午，驻丰台的日军步兵旅第 1 团第 3 营第 6 连，到卢沟桥北回龙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企图夺取卢沟桥。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 15 公里处的永定河上，始建于 1192 年（金明昌三年），以造桥技术“高超绝伦”和“造型精美”而闻名于世。卢沟桥及座落桥东头的宛平城，为北平西南重要通道。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朝云新闻社，昭和五十年版，第 71—75 页。

郭景兴、吕淑苹：《有关卢沟桥事变的地名续考》，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3 期。

当日深夜，演习日军借口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这个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向宛平城开枪示威。团长牟田口廉也命令驻丰台营区的日军第 3 营前去支援。20 分钟后，失踪士兵已经找到，但日军仍不罢休，继续扩大事态。8 日凌晨，日军向回龙庙和宛平城发起进攻。驻天津之“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命令进攻部队“确保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地区”“解除永定河东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武装”，并从天津派出步兵第 1 团第 2 营向北平增援。

此时，驻守宛平城和卢沟桥的是第 29 军第 37 师第 110 旅第 219 团第 3 营。

第 29 军是由原西北军一部改编而成，曾在长城抗战中大破日军于喜峰口而赢得良好声誉。第 29 军广大官兵在华北长期受到日军无理挑衅和蛮横压迫，同时受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影响，有爱国热情和对日抵抗的决心。第 29 军军部得知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的报告，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宋哲元回山东乐陵省亲）立即电示第 37 师师长冯治安及 219 团团团长吉星文：“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荣誉，务即晓喻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①旅长何基沣也命令部队：对“日军武力侵犯坚决回击”；“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②卢沟桥全体守军英勇抗击，打退日军对宛平城的多次进攻。8 日下午，日军由回龙庙附近渡过永定河，占领河西岸和铁路桥，拟待援军到达后再攻宛平城。午夜，中国驻军进行反击，他们在“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誓言下，手提大刀，冲入敌阵，展开肉搏战，终于在 9 日

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载台湾《传记文学》，1964 年 6 月出版。
《七七事变》，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第 34 页。

凌晨将日军赶回永定河东岸，收复铁路桥。第 29 军初战获胜。

卢沟桥畔的枪声是对全国军民的动员令。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同时朱德等致电宋哲元等，愿作 29 军后盾。全国各地各界声援 29 军的电报、物资源源不断涌向北平。北平各界救亡团体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北平学联发起万条麻袋运动。茶商发起万包茶叶运动。长辛店工人收集铁轨、枕木，帮助部队修筑工事。农民帮助部队修路，送水送饭，运送弹药物资。

南京政府以及蒋介石、宋哲元对卢沟桥事变采取比较游移的态度。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与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庐山，军政部长何应钦则远在重庆。8 日当蒋介石得到事变消息时，对日军制造事变的意图性质尚未作出明确判断。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① 蒋介石当日采取的应急措施是，致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以备事态扩大”；并决定调派军队增援北平。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方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派代表根据正确事实“立谋和平解决”。9 日，蒋介石密令孙连仲第 26 路军、庞炳勋第 40 军等部共计 4 个师，向石家庄、保定方面集结，表示了蒋介石准备抗战的初步意向。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1 册，11 页。

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亲日派汪精卫等大唱“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调。张群则提出“和必大败，战必大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会议最后决定了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的方针。在这条方针指导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顾日本大量增兵华北的事实，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与日方直接谈判；一方面通过英美等第三国向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试探。对在北平已进行的冀察当局与日军的谈判，蒋介石也未予制止，只要求其中央步调一致，以不丧失主权为原则。

17日，日本向中国外交部递交最后通牒式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即时停止一切挑战的言行”，并“不妨碍地方当局实行解决条件之事”，企图与宋哲元冀察当局单独解决华北政局。这时，蒋介石发表了态度比较强硬的“庐山谈话”，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退让的“最后关头”，阐述了中国政府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这篇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②。蒋介石庐山谈话后的第三天，国民政府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43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第2版，第344页。

外交部又向日本大使馆递交备忘录，继续表示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之意。

29 军广大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对日军的横逆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要求坚决抵抗。宋哲元等人处于矛盾之中。他们既对日本抱有幻想，企图通过对日妥协让步，保存实力；又不相信蒋介石会真正抗战，深怕自己因坚持抵抗却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而遭到“灭顶”之灾。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秦德纯、张自忠等同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日本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进行谈判。双方确定：一、第 29 军声明向日军道歉，并处分责任者；二、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附近和宛平城，由保安队接防；三、彻底取缔蓝衣社、共产党等抗日团体。11 日宋哲元由山东返回天津表示同意以上三项协定。12 日，宋哲元发表声明，表示要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同时下令：从 14 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军磨擦。14 日，宋哲元派张自忠等作为他的代表同日军参谋长桥本就实行三项协定具体问题进行了谈判。18 日，宋哲元、张自忠在天津拜会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19 日，宋哲元返回北平，立即下令拆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查禁抗日书报，要求孙连仲等部停止北上，并将冯治安师调离北平。宋哲元谢绝全国人民对第 29 军的支援，退还各地捐款。7 月 23 日，国民政府原则上批准了冀察当局与日方签订的上述三项协议。

在日本内阁和军部内，对卢沟桥变事的处置分成“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以陆相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等为代表的“扩大派”，主张即速派兵进攻华北和上海，以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认为只要对中国一击，中国就会被击败而屈服。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不扩大派”，主张控制事变，防止扩大为全面战争。石原莞尔从日军在远东的整体战略出发，认为

“目前我国正在专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完成对苏军备，以此而安定国防，不要把手伸向中国弄得支离破碎。”^① 8 日，日本内阁会议确定实行所谓“不扩大”与“现地解决”方针。但在军部占优势的“扩大派”以及关东军、朝鲜军和“中国驻屯军”中好战分子的鼓动下，以近卫文麿为首相的日本政府还是采取了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具体步骤。7 月 11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日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关于增兵华北的方案，决定从国内动员 2 个师、关东军 2 个旅和朝鲜军 1 个师增援华北。这个决定在当天就得到了日本天皇批准。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并在国内进行了第一次动员。关东军独立混成第 1、第 11 旅，朝鲜军第 20 师向华北开进。海军省、部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协定》、《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编组赴华作战临时航空兵团。

7 月 15 日“中国驻屯军”确定的华北作战部署是第一步迅速消灭第 29 军，占领平津地区；第二步，向保定、石家庄推进，与当地中国军队决战。

20 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第二次动员，从国内向华北派遣 3 个师。同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对中国“坚决使用武力”。

在完成以上准备后，7 月 25 日下午，日军向廊坊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6 日，参谋本部下令对中国行使武力。日军向广安门中国驻军挑衅，并发生战斗。当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 28 日正午以前将第 29 军第 37 师撤至永定河以西。28 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南苑、西苑等地的第 29 军阵地进行反复轰炸。日军第 20 师从东南、正南、西南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军部》（1），第 432 页。

② 即“师团”，其编制比中国军队的“师”大得多。又，本书将日军的“旅团”、“联队”、“大队”、“中队”等分别译为“旅”、“团”、“营”、“连”等。

3个方向，在炮兵、坦克掩护下向南苑发起进攻。

第 29 军官兵在廊坊、广安门、南苑、天津等地区与日军进行激战。28 日，当日军主力在北平外围发动进攻时，驻天津的 29 军部队对被日军占据的天津总站、东局子飞机场和海光寺兵营等地主动发起进攻；对日军停泊在大沽和塘沽港口的船只、栈桥、货场、仓库，进行了攻击和破坏。驻北平第 29 军部队向丰台出击，并占领丰台车站。但由于日军攻势猛烈，第 29 军基本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作战术性防御。宋哲元等感到问题严重，想采取措施，但为时已晚。28 日，南苑战斗失利，中国官兵伤亡 5000 余人，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壮烈殉国。北平、天津在 7 月 29 日和 30 日相继失陷。“日军在天津市区肆意烧杀，飞机轰炸、炮火肆虐，和平民众陈尸塞道，文化机关惨遭摧残。”^①南开大学、河北第一女子师范大学、工学院等学校尽成废墟。

平、津失陷后，蒋介石感到和平解决无望，遂决心抗战。7 月 30 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复兴民族。”

（二）“八一三”上海抗战与全国 抗战局面的形成

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平津后，即按既定方针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进攻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同时调集兵力向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上海进攻，企图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南北呼应，使中国完全屈服。

日本在上海早就驻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在虹口设

上海《大公报》，1937 年 8 月 1 日。

有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卢沟桥事变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请求内阁和陆军省向上海派兵增援，正在台湾地区进行演习的日本海军第 3 舰队也立即驱驰上海。7 月 16 日，第 3 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对华用兵意见》，认为“膺惩中国应是作战指导方针之唯一目标，如果限制作战区域，将使作战时间迁延。中国军队集中后，日军作战就会困难。所以，应在开战之初，使用全部航空兵力量消灭中国空军，同时攻取上海、南京 这是制中国死命的最重要手段。”为此“，必须派遣陆军 5 个师来华作战”^①。7 月 29 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把青岛、上海作为预定作战目标。

8 月 9 日，日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等乘车直冲沪西虹桥军用机场，被中国保安队员当场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向中方提出交涉。海军军令部下令在佐世保军港待命的军舰和特别陆战队开赴上海，日本在上海的兵力骤然增加到 12000 多人。在沪日军以虹口陆战队司令部为中心构筑阵地 80 多处。第 3 舰队进入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同日，海军军令部向第 3 舰队下达了“确保上海的命令”。

中国政府为防止日军突然进攻，于 8 月 11 日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驻苏、锡、常一带的第 87、第 88 师及两个炮兵团秘密进入上海；第 55、57 两个师及独立第 25 旅，进入上海郊区。

8 月 13 日上午，日陆战队一小分队冲进横浜路、宜兴路地段，向中国军队开火。下午，日军再向八字桥、六通庵、宝兴路、宝山路一带进攻。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开炮轰击闸北地区。张治中指挥部队奋起还击，淞沪抗战爆发。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的炮声，震撼了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

〔日〕《现代史资料》（9），第 185—186 页。

石。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近，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声明列举“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之事实，陈述“七七事变”后中日交涉的经过，揭露了日本“不扩大”方针的虚伪性，“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所有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15日，日本政府发表实际是宣战诏书的帝国政府声明。同日，参谋本部令以第3、第11师为骨干组成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为司令官，向中国开进。17日，松井石根晋谒天皇，接受了“平定敌军、宣扬皇军威力”的“圣谕”。31日，参谋本部命令组建“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为司令官，华北兵力扩大到8个师以上。9月2日，日本把卢沟桥事件以来所谓“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正式放弃“不扩大”方针。9月5日，内阁首相近卫在议会发表演说，表示日本“可能采取之手段，只有彻底打击中国军队，使其丧失战斗力。”日本国会批准了超过20亿日元的临时军费开支。日本完全走上全面侵华战争道路。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炮声促进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

首先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通过谈判，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二次合作。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障碍，在两党合作宣言和红军改编后的编制、指挥等问题上未能达成正式协议。8月9日，受国民党邀请，中共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抗日大计。同时，就发表两党合作宣言，确定共同抗日政治纲领，决定国防计划，确定红军指挥系统及初步补充数量，红军作战方针等问题，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八一三”上海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急需红军开赴前

线作战，遂于 8 月 22 日同意将红军改编，并答应每月发给军饷 50 万元，另拨开拔费 20 万元及部分物资装备。同时，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在国民党地区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也达成原则协议。8 月 25 日，中共宣布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 3 个师，林彪、聂荣臻分任第 115 师正、副师长，贺龙、肖克分任第 120 师正、副师长，刘伯承、徐向前分任第 129 师正、副师长，全军共 4.5 万人。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是两党合作抗日的政治宣言和各党派合作的政治纲领。23 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全国人民，得到全国各抗日阶级、阶层的热烈拥护。宋庆龄撰文欢呼：“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的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中国人民必然不会灭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灭他们。”^① 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撰文说：“我国已恢复了民国十六年前全民族一致团结以谋民族复兴的精神。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证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打击。”^② 《全民周刊》发表社论说：“国共两党的紧密合作……是非常可庆幸的事。”^③“坚信全国的一切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 101 页。

《邹韬奋文集》（1），第 211—212 页。

力量将一天天团结到这个中心的周围来”。^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喜讯传到海外，广大爱国侨胞欢呼雀跃，通电庆贺。菲律宾华侨劳工抵货会给国共两党打来贺电说：“菲律宾工人，誓与全体侨胞携手并肩的追随两党同志共同奋斗。”^②

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动全国一切爱国党派间的团结合作。国内主要的爱国党派，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联共抗日。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勱、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等致函蒋介石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抗日，“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③战前因进行抗日救国工作而一度遭到国民党逮捕的张申府说：“我曾说，蒋先生只要发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幸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④以抗战为契机，长期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开始走向团结和统一。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自动解散以抗日反蒋为目的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表示“拥护政府”。^⑤与蒋介石长期对立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愿在蒋介石领导下抗战到底。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各派军事势力共商抗战大计。

国民党各派军队，桂军、川军、滇军、粤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分赴各个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国防会议后，刘湘、邓锡侯等决定抽调川军30万人，编成两个纵队出师抗日。9月初，川军分两路出四川：一路北出剑门，经陕西，开赴山西前线；一路东出夔门，经湖北，开赴华东前线。两路川军先后参加了太原战役、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台

^①《全民周刊》第1卷第4号，1938年1月11日。

^②《新华日报》1938年5月20日。

^③《文汇年刊》报，1939年5月出版。

^④张申府：《目前的根本任务》，见《我相信中国》。

^⑤《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儿庄战役、武汉战役等，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龙云将滇军编为 1 个军，共 4 万余人，由卢汉任军长，率部出征。这支军队 10 月初离开云南，向贵州进发，经 40 多天步行，跋涉 4000 余里，抵达长沙、武汉，后又在鲁南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李宗仁在广西征集新兵 10 万余众，编组 1 个集团军、2 个军。10 月初，李宗仁率部取道湖南，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战役。阎锡山的晋绥军改编为两个集团军，在晋北、晋东地区，与八路军、中央军、川军、西北军协同进行了忻口战役和娘子关战役。

全国抗战动员了广大人民。地处战区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积极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们运军粮，送子弹，给军队带路，传递情报，组织宣传，救护伤员，献钱献物，参军参战。

聚居东北的满、朝鲜、赫哲等少数民族，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蒙族和汉族同胞合作，组织了“蒙汉抗日游击队”，在绥远的大青山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回族同胞组织了数千支回民抗日武装，投入抗日游击战争。湘西苗族起义部队 8000 余人，抛弃旧怨，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参加了湘北战役。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各族人民也积极献钱献物，支援抗战。身居异国的海外侨胞，除积极捐钱捐物外，还派遣大批热血青年回国参加抗战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三）各党派对于夺取抗战胜利的不同认识

抗日战争在全国的兴起，使中国人一吐因屈辱外交长期郁结在胸中的恶气，开始了民族解放革命战争的壮举。但对于如何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抗战的前途如何等等重大问题，在国共两党

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般地说，当时在国内存在着两种抗战主张和两条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认为，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根据地；配合友军作战；钳制和消灭敌人；实行游击战争作战原则；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中共为此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国民党实行单纯的政府抗战，这是错误的片面抗战方针。因为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在本质上是一场空前的人民革命战争。离开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没有对群众的深入广泛的动员，就不能取得战争的完全胜利。国民党在抗战开始后表现了一定的政治进步，但仍然拒绝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压制人民、脱离人民的错误政策，拒绝政治开放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而只是实行单纯的政府抗战和片面的军队抗战。在如何坚持抗战的问题上，国民党拒绝了共产党和其它民主爱国力量关于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实行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

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①国民党以上错误政策和做法，是以后中国抗战发生曲折、困难的根本的主观原因。

关于抗日战争应实行持久战战略方针，这在各党派各军队之间基本上得到原则的认同。

1937年8月7日至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8月18日，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具体阐述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随后，国民党军事当局即把“持久消耗战”思想归纳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与其单纯的片面抗战方针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军事战略方针。这种“持久消耗”战略把“以空间换时间”作为核心口号，这既从根本上忽视了全国抗日军民在抗战中的决定作用，又未将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实现持久战略的首要目标和主要手段。而且这种“持久消耗”战略，缺乏正确的战场作战方针作为其基本支撑和内容。它是国民党长期形成的“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设防，处处据守”，“深沟、高垒、厚壁”等等消极防御的阵地战思想在战略上的反映。事实证明，没有正确的战场作战方针，就不可能达到持久抗战的战略目的。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战略防御中的失利，从军事上看，实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依敌我情况的特点，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和实行持久战的作战原则。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8月上旬送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确立全面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明确提出：抗战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版，第353页。

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战略上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则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包围和歼灭敌人；其主要作战方式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科学地总结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思想，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回答了许多人思想上存在的疑虑。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基本特点，预见持久战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不同的作战阶段和总体进程。毛泽东指出，坚持持久战的基础是发动全民族的武装自卫战，实行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在作战原则上，必须是把正规战和游击战相结合，以正规战为主；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以运动战为主，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毛泽东认为，抗日持久战将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它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②

《论持久战》是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抗战当之无愧的指导纲领。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版，第511页。
同上，第479页。